

社交媒体环境下健康数字囤积行为的认知 - 情感 - 能力驱动机制研究

兰 雪 何佳陆 刘春鹤

(中国医科大学健康管理学院 沈阳 110122)

〔摘要〕 **目的/意义** 探究社交媒体用户健康数字囤积行为的认知 - 情感 - 能力驱动机制, 为理解该行为形成逻辑、制定干预策略提供依据。**方法/过程** 基于风险信息搜寻与加工模型, 整合错失焦虑变量, 构建认知 - 情感 - 能力分析框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 575 份有效数据, 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结论** 健康风险认知通过两条链式路径影响健康数字囤积行为: 一是“健康信息焦虑→信息不充分性”, 二是“健康信息焦虑→错失焦虑”。知觉信息收集能力既直接正向影响该行为, 又通过加剧错失焦虑产生间接效应。

〔关键词〕 数字囤积行为; 风险信息搜寻与加工模型; 错失焦虑; 风险认知; 社交媒体

〔中图分类号〕 R-058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673-6036.2025.10.005

The Cognitive - Affective - Ability Driving Mechanism of Health Digital Hoarding Behavior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Media

LAN Xue, HE Jialu, LIU Chunhe

School of Health Management,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22, 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cognitive - affective - ability driving mechanism of users' health digital hoarding behavior in social media, an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logic of this behavior and formulating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RISP) model, the variables of fear of missing out (FoMO) are integrated, and a “cognitive - affective - ability” analytical framework is constructed. A total of 575 valid data a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s used for empirical testing. **Result/Conclusion** Health risk perception affects health digital hoarding behavior through two chain paths: one is “health information anxiety → information insufficiency”, and the other is “health information anxiety → FoMO”. Perceived information gathering ability not only directly and positively affects this behavior, but also has an indirect effect by exacerbating FoMO.

〔Keywords〕 digital hoarding behavior; 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RISP) model; fear of missing out (FoMO); risk perception; social media

〔修回日期〕 2025-09-03

〔作者简介〕 兰雪, 博士, 讲师, 发表论文 10 余篇。

〔基金项目〕 辽宁省教育厅基本科研项目 (项目编号: JYTQN2023037)。

1 引言

目前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已成为公众获取健康信息的关键渠道, 其使用过程中“收藏即闲置”

的健康数字囤积现象衍生独特风险。用户大量存储养生贴士、医疗知识却极少复用,既因冗余信息堆积使急病决策陷入“垃圾场困境”^[1],又因经常浏览这类极少复用的内容放大了健康焦虑^[2]。与一般数字囤积不同,健康数字囤积直接关系生命健康决策,行为强度受个体健康风险认知(health risk perception, HRP)、焦虑情绪双重驱动,易从适度储备异化为过度囤积。既有研究多聚焦一般数字囤积现象描述,对健康场景下的行为机制探索存在明显缺口:一是未厘清认知(风险感知)-情感(焦虑情绪)-能力(信息处理)交互驱动囤积行为的方式;二是缺乏对社交媒体社交属性催生的错失焦虑作用的深入解析。这些空白导致难以精准理解健康数字囤积的形成逻辑,制约针对性干预策略制定。本研究引入风险信息搜寻与加工(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RISP)模型,纳入错失焦虑(fear of missing out, FoMO)补充情感维度,构建理论分析框架,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进行实证检验。在理论层面系统揭示健康数字囤积中认知-情感-能力协同驱动机制,拓展 RISP 模型在健康信息行为研究中的应用边界;在实践层面为社交媒体平台提供优化建议,帮助用户更好地管理健康信息,避免过度囤积带来的负面影响。

2 研究现状

近年来,数字囤积作为数字信息环境中的典型行为受多学科关注,其内涵从“数字文件过度积累导致检索障碍与个体压力”^[3]逐步扩展至多场景下的信息囤积现象^[4-6]。本研究聚焦的健康数字囤积行为(health digital hoarding behavior, HDHB),指社交媒体用户在健康信息获取过程中,盲目收集、存储健康信息,却长期未进行有效整理与利用的行为。已有研究从多维度探索数字囤积影响因素:认知维度,任务紧迫性引发的信息重要性认知^[7-9]、学术资源价值判断^[10-11]会驱动囤积行为;情感维度,社会比较与错失焦虑会强化数字囤积^[12-14],

信息焦虑可能引发强迫性信息收集^[2];能力维度,个体信息处理能力的影响存在争议,部分研究^[15]认为高信息素养会减少囤积,另一部分研究^[8,16]则发现信息收集能力强者更易主动储备。从研究情境看,数字囤积研究已从工作、学术场景延伸至社交媒体^[16],但针对健康风险情境的探索仍较薄弱。

3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3.1 RISP 模型

RISP 模型由 Griffin R J 等^[17]提出,描述个体面对风险时寻求和处理信息的方式,近年来广泛用于健康风险情境(如抗生素使用^[18]、肥胖^[19])。RISP 模型核心部分包含风险认知、情感反应、信息不充分性(information insufficiency, II)和知觉信息收集能力(perceived information gathering capacity, PIGC)^[20],在健康数字囤积行为研究中展现出良好适用性。数字囤积本质是通过数字存储替代人脑信息加工的海量信息获取行为,RISP 模型的认知、情感要素可有效分析个体面对健康风险信息时的获取和处理机制^[21]。社交媒体信息的价值稀缺性与不确定性,促使用户通过数字储备实现风险规避^[22]。

3.2 错失焦虑

社交媒体环境下,错失焦虑表现为用户因无法与现实或虚拟世界保持即时连接而产生的焦虑^[23]。作为焦虑情绪的一种,错失焦虑在健康信息搜寻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24],主要表现为渴望持续、及时获取相关健康信息^[25],以缓解内心不适^[26];而过量信息会加剧焦虑,形成信息获取-焦虑强化循环,最终表现为强迫性数字行为。

3.3 研究假设

3.3.1 健康风险认知与健康信息焦虑 健康风险认知是个体对健康风险事件的主观判断(包含可能性和严重性)。当个体感知到较高风险时,信息缺失可能加剧其对健康威胁的担忧,进而触发健康信息处理流程中的特定情绪反应^[27]。健康信息焦虑(health information anxiety, HIA)是个体在健康信

息获取全流程中所产生的担忧、不安等情绪集合^[28]。由于健康风险认知通过“风险感知→情感响应”路径直接关联健康信息焦虑的产生逻辑，因此提出假设 H1：健康风险认知正向影响健康信息焦虑。

3.3.2 健康信息焦虑与健康数字囤积行为 (1) 信息不充分性。信息不充分性是个体意识到现有知识水平无法解决问题的不满足感。由风险认知产生的担忧或焦虑等情感反应会促使个体产生信息不足的判断，从而产生信息需求^[29]。为缓解这种焦虑，个体倾向通过囤积行为填补认知空白——存储更多健康信息以获得掌控感^[30]。据此提出假设 H2：健康信息焦虑正向影响信息不充分性。H2a：健康信息焦虑在健康风险认知和信息不充分性之间起中介作用。健康需求升级推动用户密集浏览健康信息，易引发认知负荷超载。根据认知负荷理论，当信息数量与复杂度超出处理能力时，内在认知负荷急剧攀升^[31]。此时，直接收藏存储成为低负荷策略——既缓解遗漏关键信息的焦虑^[10]，又将加工压力转移至未来。个体囤积数字资源的核心动机是预期未来可能有用^[32]，这种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会进一步驱动个体通过持续存储构建信息安全感，最终形成数字囤积闭环。基于此，提出假设 H3：信息不充分性正向影响健康数字囤积行为。H3a：信息不充分性在健康信息焦虑和健康数字囤积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H3b：健康信息焦虑和信息不充分性在健康风险认知和健康数字囤积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2) 错失焦虑。有研究^[33-34]发现错失焦虑与负向情绪有关。社交媒体环境下，健康风险信息传播速度极快，但质量参差不齐。这些真伪难辨的健康信息会引发错失焦虑^[27,32]。因此提出假设 H4：健康信息焦虑正向影响错失焦虑。错失焦虑会导致用户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在互联网上搜索和获取相关信息。研究^[35]证实错失焦虑会直接影响数字囤积行为。健康风险认知的高警觉性，可能通过健康信息焦虑间接传导，即高健康风险认知易引发个体对健康信息的焦虑感（担心遗漏关键健康信息、误解健康知识等），而这种焦虑感又可能进一步强化错失焦虑，最终共同影响健康数字囤积行为。据此提

出假设 H5：错失焦虑正向影响健康数字囤积行为。H5a：错失焦虑在健康信息焦虑与健康数字囤积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H5b：健康信息焦虑和错失焦虑在健康风险认知和健康数字囤积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3.3.3 知觉信息收集能力 知觉信息收集能力是个体对自身获取、理解特定风险信息的自我效能感^[17]。目前对于知觉信息收集能力与数字囤积行为的关系尚未达成共识，研究结论差异可能源于研究对象群体特征（如年龄、数字素养）与研究情境的不同（如一般信息、特定领域信息）^[31,36-37]。在健康风险情境中，高能力者因自我效能强，既降低存储冗余顾虑，又通过损失规避，储备使用频次低、影响大的健康信息^[38-39]，直接驱动囤积。因此提出假设 H6：知觉信息收集能力正向影响健康数字囤积行为。信息过载和数字设备使用压力（均属能力相关表现）诱发错失焦虑^[12,40]，高能力者对信息错失成本更敏感，间接加剧囤积。由此可推断，知觉信息收集能力可能对错失焦虑产生影响。因此提出假设 H7：知觉信息收集能力正向影响错失焦虑。H7a：错失焦虑在知觉信息收集能力与健康数字囤积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基于以上分析，基于 RISP 模型构建健康数字囤积行为的认知-情感-能力驱动模型，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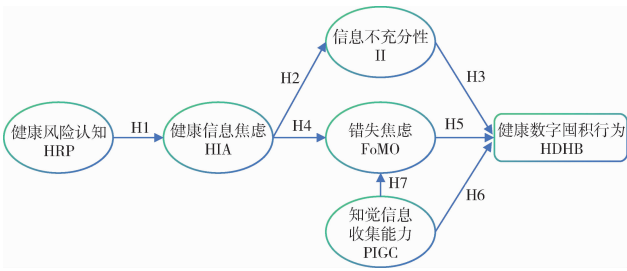


图 1 社交媒体环境下健康数字囤积行为的
认知-情感-能力驱动模型

4 方法

4.1 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包括人口统计学（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健康状况）题目和理论模型相关变量测量题

目。相关题目改编自成熟问卷，经预调查（63 份有效问卷）完善，整体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0，信度良好。经验证性因子分析，删除 6 个载荷系数小于 0.6 的题目，最终保留 18 个题目，见表 1。

表 1 健康数字囤积行为调查问卷题目及来源

变量	题目	来源
健康风险认知	我认为我有极大可能存在健康隐患问题	彭丽徽等 ^[41]
	我身边的人有极大可能存在健康隐患问题	
	我认为一旦身体出现问题，将会很严重	
	如果我生病了，那将是有风险的	
健康信息焦虑	当获取的疾病信息太多或太少时，我会感到厌烦和着急	姚海燕等 ^[42]
	当要花费很多时间来筛选、核对疾病信息时，我会感到难受	
	我会因缺乏对疾病有关信息的认识而感到沮丧、失落	
错失焦虑	我总是害怕错过或遗漏疾病相关的重要新闻报道	陈明红等 ^[26]
	我总是想要获取尽可能多和全面的健康风险信息，不然会感到不踏实	
	我总是忍不住刷新各平台动态查看是否有新的健康相关信息	
	当比其他 people 更晚知晓或获取某些健康风险信息时，我会感到不安和焦虑	
信息充分性	我认为我很需要健康相关的信息和知识	秦琴等 ^[43]
知觉信息收集能力	我能够从找到的所有健康信息中选择最适合我的	赵冰悦等 ^[44]
	我能确定我找到的健康信息是真实可靠的	
健康数字囤积行为	我会存储那些他人可能不会保留的健康信息	闫晓倩等 ^[45]
	存储健康信息会给予我安全感	
	因为一些健康需求，我无法删除某些健康信息	
	删除某些健康信息，意味着我要花费更多时间去记忆相关信息	

4.2 数据采集

通过微信、微博平台招募调查对象，通过问卷星发布问卷，采集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21 日—3 月 21 日。通过筛选题“是否有使用社交媒体大量收集存储健康信息的习惯”排除无效样本，共收集有效问卷 575 份。其中，女性占比 64.79%，31~40 岁群体占比 42.96%，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 83.98%。

4.3 数据分析方法

PLS-SEM 可基于小样本数据构建含反映型与形成型指标的混合模型，避免了传统 SEM 处理多维度数据时易出现的收敛难题，支持以单个可观测变量作为某一构念的观测指标，适用于信息不充分性变量。本研究中健康数字囤积行为是形成型指标，其余变量是反映型指标，因此采用 PLS-

SEM 验证假设模型。使用 SmartPLS4.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5 结果

5.1 反映型和形成型测量模型评估

5.1.1 反映型测量模型 所有潜变量的 Cronbach’s α 和复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值为 0.624~0.861，见表 2，均超过 0.6^[46]，内部一致性良好。由于借鉴成熟量表并实施预调研，有效保障了内容效度。因子负荷均大于 0.7，平均方差提取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均大于 0.6，高于 0.5 临界值，收敛效度良好。通过交叉载荷和异质-单质比率（heterotrait-monotrait ratio of correlations，HTMT）检验区分效度，交叉载荷显示观测变量与对应潜变量关联最强；HTMT 值均小于 0.85^[47]，区分效度良好。

表 2 反映型测量模型的信度和收敛效度检验结果

潜变量	观测变量	因子负荷	Cronbach's α	CR	AVE
HIA	HIA1	0.847	0.804	0.884	0.717
	HIA2	0.836			
	HIA3	0.857			
PIGC	PIGC1	0.864	0.641	0.848	0.736
	PIGC2	0.851			
FoMO	FoMO1	0.848	0.861	0.905	0.705
	FoMO2	0.834			
	FoMO3	0.853			
	FoMO4	0.824			
HRP	HRP1	0.822	0.800	0.869	0.624
	HRP2	0.740			
	HRP3	0.826			
	HRP4	0.769			

5.1.2 形成型测量模型 形成型测量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值均小于 3.30，多重共线性问题较小；观测变量权重均大于 0.20，且健康数字囤积行为的观测变量在其对应的构念上载荷最高，模型区分度能够有效区分不同构念。

5.2 结构模型

采用 Bootstrapping（5 000 次随机重抽样）检验路径系数，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为 0.057，低于 0.08^[48]，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模型对健康

数字囤积行为、健康信息焦虑及错失焦虑的变异分别具有 42.5%、30.6% 和 50% 的解释力。模型路径分析结果，见表 3。健康风险认知正向影响健康信息焦虑（ $t = 17.001$ ），假设 H1 成立；健康信息焦虑正向影响信息不充分性（ $t = 6.405$ ）、错失焦虑（ $t = 28.225$ ），假设 H2、H4 成立；信息不充分性（ $t = 5.824$ ）、错失焦虑（ $t = 11.85$ ）、知觉信息收集能力（ $t = 5.957$ ）均正向影响健康数字囤积行为，假设 H3、H5、H6 成立；知觉信息收集能力还正向影响错失焦虑（ $t = 6.61$ ），假设 H7 成立。所有假设均获支持（ $P < 0.01$ ）。假设 H3a、H3b、H5a 和 H5b 的间接效应均显著（ $P < 0.01$ ），表明健康数字囤积行为通过认知 - 情感 - 能力的多层链式中介传递影响。知觉信息收集能力与健康数字囤积行为之间既有直接影响，也通过错失焦虑间接影响，验证了假设 H7a 的有效性，见表 4。

表 3 路径分析结果

假设	路径	标准差	<i>t</i>	<i>P</i>	是否支持假设
H1	HRP → HIA	0.033	17.001	***	是
H2	HIA → II	0.040	6.405	***	是
H3	II → HDHB	0.034	5.824	***	是
H4	HIA → FoMO	0.024	28.225	***	是
H5	FoMO → HDHB	0.039	11.85	***	是
H6	PIGC → HDHB	0.038	5.957	***	是
H7	PIGC → FoMO	0.030	6.61	***	是

注：*** 表示 $P < 0.01$ 。

表 4 中介效应结果

假设	中介路径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总效应	中介类型
H2a	HRP → HIA → II	0.142 ***	0	0.142	完全中介
H3a	HIA → II → HDHB	0.051 ***	0.364 ***	0.415	部分中介
H3b	HRP → HIA → II → HDHB	0.028 ***	0.201 ***	0.229	部分中介
H5a	HIA → FoMO → HDHB	0.313 ***	0.364 ***	0.677	部分中介
H5b	HRP → HIA → FoMO → HDHB	0.377 ***	0.201 ***	0.578	部分中介
H7a	PIGC → FoMO → HDHB	0.090 ***	0.090 ***	0.180	部分中介

注：*** 表示 $P < 0.01$ 。

6 讨论

通过 PLS - SEM 模型验证社交媒体环境下健康

数字囤积行为的认知 - 情感 - 能力驱动机制，发现两条关键路径：认知 → 情感 → 行为路径、能力 → 情感 → 行为路径。

6.1 认知——情感——行为路径

研究结果显示,健康风险认知对健康数字囤积行为的影响通过情感中介实现,具体表现为两条传导链条:一是健康信息焦虑通过强化信息不充分性感知驱动囤积,这与认知负荷理论预测一致,也解释了高健康风险认知用户更倾向通过囤积构建信息安全感的原因,其本质是对健康不确定性的适应性心理补偿;二是健康信息焦虑引发的错失焦虑成为更强势中介变量,表明社交媒体社交属性放大了健康信息错失威胁。健康信息时效性与社交传播特性使个体将信息缺失等同于“健康管理落后于他人”,这种社交比较驱动的焦虑进一步强化囤积行为^[29]。该发现拓展了 RISP 模型的情感维度:传统模型聚焦信息需求驱动的焦虑,本研究揭示社交错失焦虑是健康场景下更关键的情感放大器,弥补了传统模型未关注社交场景对个体健康焦虑影响的不足。

6.2 能力——情感——行为路径

知觉信息收集能力对健康数字囤积行为的影响呈现“直接+间接”的双重特征。从直接效应看,高知觉信息收集能力者因能精准识别健康信息价值,更倾向主动储备潜在有价值内容^[44]。这与张艳丰等^[12]研究一致,即信息处理能力强的个体更可能囤积价值高、使用频次低的信息,体现前瞻性健康管理理性的一面。从间接效应看,信息处理能力强的个体对信息错失成本更敏感,更清楚哪些信息可能影响健康决策,因此更担忧错过关键内容,这种认知强化错失焦虑^[7]。例如,擅长辨别医疗信息可信度的个体,会因害怕遗漏权威机构发布的健康指南而频繁囤积,形成能力-焦虑-囤积循环。该发现回应了学界对能力与囤积关系的争议,揭示了健康场景的特殊性:能力并非单纯抑制囤积,而是通过提升信息价值敏感度间接放大错失焦虑,最终促进数字囤积行为。

6.3 社交媒体的引导策略

认知层面,社交媒体平台可通过用户画像推送与其实际风险相关的信息,减少泛化内容导致的认

知负荷。例如,针对高血压用户推送个性化管理方案,而非无差别推送所有慢性病信息,降低信息过载引发的囤积冲动。联合专业机构解读信息(如标注“权威来源”“适用人群”),帮助用户建立对健康风险的理性认知,减少因风险误判产生焦虑性囤积。情感层面,平台可通过功能设计弱化健康信息社交错失暗示,例如减少“好友已收藏”等推送,或者开发信息价值分级工具(如标记“必备知识”“拓展内容”),帮助用户区分必须关注与可选择性忽略的信息,缓解错失焦虑带来的心理负担。此外,建立健康信息审核机制,阻断伪科学内容传播,减少因信息混乱引发的焦虑性囤积。能力层面,针对高知觉信息收集能力用户,提供智能归档、定期清理提醒等工具,帮助其将囤积的高价值信息转化为可利用知识;针对能力较弱用户,开发信息筛选模板(如按“可信度”“适用性”排序),减少其因不知如何筛选而产生的盲目囤积。

7 结语

本研究通过理论创新与模型拓展,系统揭示了社交媒体环境下健康数字囤积行为的认知-情感-能力驱动机制。理论层面,拓展 RISP 模型情感维度,补充社交错失焦虑这一健康场景特有的情感放大器,为认知-情感-行为联动机制提供实证支撑;实践应用层面,对平台提出包括弱化社交错失暗示、优化信息分级审核、开发差异化工具等针对性建议。本研究局限性在于,受筛选条件和招募渠道影响,样本呈现高学历化特点,所构建的认知-情感-能力驱动模型解释力可能更适用于与本样本特征相似的群体。未来研究将重点关注不同学历背景、年龄层次或数字素养水平用户的健康数字囤积驱动机制。

作者贡献: 兰雪负责研究设计、数据分析、论文撰写;何佳陆负责问卷设计、问卷发放与收集;刘春鹤负责数据分析。

利益声明: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赵栋祥. 个人的数字囤积行为研究进展与展望 [J]. 情

- 报杂志, 2022, 41 (8): 194 – 200, 184.
- 2 袁静, 李柯. 移动社交媒体环境下用户信息焦虑行为研究进展 [J]. 图书情报工作, 2020, 64 (11): 133 – 144.
- 3 VAN BENNEKOM M J, BLOM R M, VULINK N, et al. A case of digital hoarding [EB/OL]. [2025 – 06 – 26]. <https://casereports.bmj.com/content/2015/bcr-2015-210814.long>.
- 4 SEDERA D, LOKUGE S, GROVER V. Modern – day hoarding: a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and measuring digital hoarding [J].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22, 59 (8): 103700.
- 5 WU D, ZHAO Y C, WANG X, et al. Digital hoarding in everyday hedonic social media use: the roles of fear of missing out (FoMO) and social media affordanc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 computer interaction, 2024, 40 (18): 5399 – 5414.
- 6 卢琪琪. 研究生数据囤积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23.
- 7 吴大伟, 练靖雯, 赵宇翔, 等. 基于 I – PACE 模型的工作情境下数字囤积行为研究: 影响因素和机理框架 [J]. 情报资料工作, 2024, 45 (4): 64 – 75.
- 8 MCKELLAR K, SILENCE E, NEAVE N, et al. Digital accumulation behaviours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the workplace: exploring the tensions between digital data hoarding, organisational culture and policy [J]. 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24, 43 (6): 1206 – 1218.
- 9 MCKELLAR K, SILENCE E, NEAVE N, et al. There is more than one type of hoarder: collecting, managing and hoarding digital data in the workplace [J]. Interacting with computers, 2020, 32 (1): 209 – 220.
- 10 代宝, 张鹏金, 王玥倩. 研究生学术性数字囤积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后果——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J]. 现代情报, 2024, 44 (4): 53 – 65.
- 11 JIA M, ZHAO Y C, ZHAN G X, et al. “That looks like something I would do”: Understanding humanities researchers’ digital hoarding behaviors in digital scholarship [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24, 81 (1): 24 – 55.
- 12 张艳丰, 杨琬琛. 移动社交媒体用户数字囤积行为影响因素与关联路径研究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3, 46 (9): 115 – 121.
- 13 张喆勤. 社交媒体信息过载对用户数字囤积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J]. 新媒体研究, 2024, 10 (14): 41 – 46.
- 14 WANG H, MIAO P, JIA H, et al. The dark side of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for social media users: an investigation of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digital hoarding behavior [J]. Social media + society, 2023, 9 (1): 1 – 13.
- 15 MILYAVSKAYA M, SAFFRAN M, HOPE N, et al. Fear of missing out: prevalence, dynamics, and consequences of experiencing FOMO [J]. Motivation and emotion, 2018, 42 (5): 725 – 737.
- 16 DABBISH L A, KRAUT R E, FUSSEL L S, et al. Understanding email use: predicting action on a message [C]. New York: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2005.
- 17 GRIFFIN R J, DUNWOODY S, NEUWIRTH K. Proposed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of 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eventive behaviors [J]. Environmental research, 1999, 80 (S2): 230 – 245.
- 18 BRINKER D L, ZHOU Y, ACEVEDO CALLEJAS M L, et al. Increasing information seeking about antibiotic risks: testing a clinical intervention message using the 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model [J].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20, 42 (2): 218 – 243.
- 19 CHOI D H, NOH G Y.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about obesity among South Koreans: applying the 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model [J].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21, 49 (2): 228 – 245.
- 20 POKRYWCZYNSKI J, GRIFFIN R J, CALHOUN G J. Information seeking among women aged 18 to 25 about the risk of sexual aggression [J].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9, 96 (1): 239 – 263.
- 21 马海云, 薛翔. 用户信息搜寻到信息规避的演化机制研究——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域为例 [J]. 现代情报, 2024, 44 (9): 107 – 118, 130.
- 22 张铮, 刘晨旭. 海量信息下社交媒体用户数字囤积的心理机制初探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5 (4): 135 – 142.
- 23 PRZYBYLSKI A, MURAYAMA K, DEHAAN C, et al. Motivational,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correlates of fear of missing out [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3, 29 (4): 1841 – 1848.
- 24 赵宇翔, 张轩慧, 宋小康. 移动社交媒体环境下用户错失焦虑症 (FoMO) 的研究回顾与展望 [J]. 图书情报工作, 2017, 61 (8): 133 – 144.
- 25 余贝迪, 王益明. 在线健康信息搜寻中健康焦虑增加现象研究 [J]. 图书情报知识, 2020 (4): 106 – 118.
- 26 陈明红, 麦洁雯. 错失焦虑视角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

- 康风险信息搜寻行为研究——基于混合方法的实证 [J]. 情报科学, 2023, 41 (6): 113 - 124, 135.
- 27 JANZ N K, BECKER M H. The health belief model: a decade later [J]. Health education quarterly, 1984, 11 (1): 1 - 47.
- 28 YANG Z J, ALOE A M, FEELEY T H. 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model: a meta - analysis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4, 64 (1): 20 - 41.
- 29 顾东晓, 孙佳月, 丁庆秀, 等. 健康信息焦虑对健康信息规避行为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 [J]. 图书情报工作, 2023, 67 (19): 111 - 120.
- 30 WOLNIEWICZ C A, TIAMIYU M F, WEEKS J W, et al. 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and relations with negative affect,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fear of negative and positive evaluation [J]. Psychiatry research, 2018, 262 (4): 618 - 623.
- 31 曹锦丹, 兰雪, 邹男男. 健康风险认知与信息交互行为关联模型研究 [J]. 图书情报工作, 2019, 63 (6): 12 - 19.
- 32 YANG Z J, KAHLOR L. What, me worry? The role of affect in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avoidance [J].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13, 35 (2): 189 - 212.
- 33 查先进, 黄程松, 严亚兰, 等. 国外认知负荷理论应用研究进展 [J]. 情报学报, 2020, 39 (5): 547 - 556.
- 34 TUGTEKINE B.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hoard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elf - efficacy, and anxiety [J].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studies, 2022, 9 (1): 157 - 177.
- 35 WU D, ZHAO Y C, WAN G X, et al. Your online favorites are overwhelming when you're having fun: an investigation of fear of missing out, social media affordances and digital hoarding [EB/OL]. [2025 - 06 - 11]. https://doi.org/10.1007/978-3-031-28035-1_9.
- 36 张艳丰, 刘敏. 现象图析学视角下移动社交媒体用户数字囤积行为机理研究 [J]. 现代情报, 2024, 44 (7): 3 - 12, 73.
- 37 程思宇, 阮建海, 邓小昭. 用户生成内容 (UGC) 平台用户数字囤积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以小红书为例 [J]. 图书情报工作, 2024, 68 (4): 58 - 69.
- 38 贾明霞, 赵宇翔, 朱庆华, 等. 双系统理论视角下用户数字囤积行为的形成机理与演化路径研究 [J]. 情报学报, 2024, 43 (3): 339 - 356.
- 39 马向阳, 徐富明, 吴修良, 等. 行为决策中的忽略偏差: 心理机制与影响因素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 (12): 1834 - 1841.
- 40 刘国亮, 张汇川, 刘子嘉. 移动社交媒体用户不持续使用意愿研究——整合错失焦虑与社交媒体倦怠双重视角 [J]. 情报科学, 2020, 38 (12): 128 - 133.
- 41 彭丽徽, 周媛, 李茜丹, 等. 风险认知视域下老年人健康信息规避行为要素及关联路径研究 [J]. 情报科学, 2024, 42 (5): 101 - 110, 148.
- 42 姚海燕, 郑双江, 罗志宏, 等. 互联网诊疗患者健康信息焦虑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研究 [J]. 心理月刊, 2023, 18 (11): 30 - 33.
- 43 秦琴, 柯青, 谢雨杉. 全球健康危机下公众的情感和认知——信息搜寻和加工行为视角下的探讨 [J]. 现代情报, 2022, 42 (4): 62 - 76.
- 44 赵冰悦, 徐钦, 王晓娟, 等. 数字健康素养量表的汉化、修订及信效度检验 [J]. 中华护理教育, 2024, 21 (1): 89 - 95.
- 45 闫晓蓓, 胡德华. 健康数字囤积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J]. 医学信息学杂志, 2024, 45 (2): 7 - 13.
- 46 URBACH N, AHLEMANN 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using partial least squares [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ory and application, 2010, 11 (2): 5 - 40.
- 47 HENSELER J, RINGLE C, SARSTEDT M. A new criterion for assessing discriminant validity invariance - bas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15, 43 (1): 115 - 135.
- 48 HENSELER J, HUBONA G, RAY P A. Using PLS path modeling in new technology research: updated guidelines [J]. Industrial management & data systems, 2016, 116 (1): 2 - 20.